



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

刘跃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

刘跃进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刘跃进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203-4167-7

I. ①简…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史—通俗读物
IV. ①I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50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顾世宝 慈明亮 曲弘梅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8.5
插 页 2
字 数 609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什么要不断地书写文学史？

刘跃进

一 文学史的困境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著录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多达上千部，蔚为大观。转眼又过去十五年，今天的文学史数量又有相当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这么多文学史，为什么还要继续撰写？

一派观点认为，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文学的历史，了解文学演变的线索，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研究具有知识传承功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在于阐释历史，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带有思想史的意味，是未来追寻历史背后的思想意义。前者看似客观，后者更多主观，作为主流的历史观，都曾影响深远。但两者又都有其偏颇，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今的文学史研究，主流之外又有新的趋向，有时不免叫人担忧。

第一是“学位体”或者“项目体”盛行。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从业者已经多达三万人以上，多是“学位体”“项

目体”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匠气化。众所周知，“学位体”通常是这样产生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范围，依据通常是文学史常识。范围确定后，再据此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编写长编，梳理成文。其实，我们的教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项目体”，往往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从选题到研究方法，都带有先入为主的特点。现在，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很多。因为程序化，以学界同仁的知识结构，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只是平面地克隆自己，把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时的感受记录下来，越做越表面化。

第二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搜集材料相对便利，学术著作出版相对容易。渴望成功的焦虑，致使学者们在学术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罔顾基本原则，标新立异，贪多求快，成批制造著作。据主管部门统计，现在年平均出版物已经多达40万种左右，其中堆积的所谓学术著作，有多少可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图书越出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

第三是强调国际化，本意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在现实中，有的研究者对西学不辨优劣，对本土文化缺乏自信，唯洋人马首是瞻，不仅对其作廉价的吹捧，甚至挟洋人自重，自己也洋腔洋调，自以为高明。还有的人，昨天还在贩卖洋货，今天又穿上中山装，摇身一变，成为国学家。

第四是自命为文化精英，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所谓纯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

第五是有意无意地误读经典，追求商业炒作，扭曲文学价值，将严肃的学术研究变成娱宾媚俗的工具，迎合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浮躁风气。

当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厌倦了为其他学科打工的时候，是否该考虑回到自己的传统？回到自己的经典？古代文学史上的《诗》《骚》、李、杜、选学、红学，还有四大名著等，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是否已经被说尽，乃至题无剩义？这些都还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学史研究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确实应当认真想一想，文学史编写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途径在哪里？

二 文学史的历史

（一）先秦两汉时期有关“文”“文学”和“文学家”的观念

所谓“文”，在先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或文采错杂，或纹路，或文章，或诗歌。

1. 《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显然这里的“文”是指彩色交错。

2. 《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这里的“文”又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

3. 作为文章意义的“文”，秦汉以来始为人们所熟知、所习用。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王安石《上张太傅书》：“夫文者，言乎志者也。”当然，这里的“文”，其含义较广。

秦汉以后，关于“文”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杜甫《春日

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就不单单是指文章，似乎还包括诗歌在内。

所谓“文学”，先秦时代的含义也非常广泛，或文章博学，或儒家学说，或文章经籍。

1. 《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颖达正义：“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这里的“文学”指文章博学，为孔门四科之一。

2. 《韩非子·六反》：“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史记·李斯列传》：“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这里的“文学”指儒家学说。

3. 《吕氏春秋·荡兵》：“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这里的“文学”又泛指文章经籍。

由文章经籍引申，凡是有学问的人，有文采的人，也可以称为文学。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即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大概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

所谓“文学家”，最早是由“文人”引申出来的。《尚书·文侯之命》：“汝肇刑文武，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这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的祖先。后来，凡是知书能文的人，都可以称为文人。傅毅《舞赋》：“文人不能怀其藻兮，武毅不能隐其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观念

鲁迅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这种自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有了自觉

的判断意识。

1. 文学家

《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所收作家当然应当算作文学家，有多少呢？总共一百三十家。^①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所论及的作家凡二百一十一人。其中，先秦三十七家，秦汉八十四家。^② 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都渊源于五经，因此，许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按照今天的观念，上述一些人物是可以在文学史中存而不论的，譬如孔安国、叔孙通等。但是，多数文学家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不仅有作品留存，而且，其中不少人在当时还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惜在后世的文学史中是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的。为什么呢？因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收录标准趋于严格化。

2. 文学作品

在古人心目中，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为了使这些文体有所归属，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七体属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赋等。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九种属文，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

① 参见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骆鸿凯《文选学》。

② 参考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由赵立生教授编写的作家释和作品释两部分统计。

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①其中，除了诗，其他三十六种属文。参照《文选》而编的《文苑英华》亦分三十七体：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其中除了诗、歌行外，三十五体归为文章。《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论列先秦两汉作品三百七十余篇（《诗经》《九歌》《九章》及诸子著作等均以一篇计算。其中汉代作品一百四十余篇）。其中也以文章为大宗。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对各种重要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②。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分类显然过于琐碎。于是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骚》等作品，或以为屈原《离骚》等属于诗歌创作吧？问题是，

^① 有的版本作三十八类，即在“书”与“檄”之间多出“移”体。见胡克家刻本《文选》后附《〈文选〉考异》。还有的作三十九类，多出“难”体。如南宋陈八郎刻本及《山堂考索》所引《文选》分类细目，就增加了“难”体。此外，台湾“中央”图书馆影印《五臣注文选》也有“难”体。

^② 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

《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家，其一就是屈原赋之属，说明在汉人心目中，屈原的作品是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说明刘勰也将屈原的作品视为赋。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以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为赋。而姚鼐《古文辞类纂》有辞赋类，选屈原《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而不选《九歌》，大约以为《九歌》名之曰歌，归入诗类。这样，自秦汉以下，辞赋均可称之曰广义的“文”。由此说明，在中国古代，至少先秦两汉，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文”。

（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从域外开始

俄国王西里（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①主要参考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1815—1897）翻译的《中国经典》，主要讨论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全书十四章。

第一章是综合论述，认为中国文学在典范性与科学性上逊色于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但是在规模与内容的丰富性上更胜一筹。其中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最大，已经渗透进了中国人的身体、血液甚至骨髓。儒学尽管没有西方的宗教形态，但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相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其对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学）都具有更大的影响。

第二章论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主要讨论中国书面文字与口语之间的脱节问题。

第三章介绍中国文字和文献的古老性问题以及中国人的看法。

^① 该书 1880 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2013 年中俄文对照出版，第 330 页。

作者从《周易》的八卦开始讨论，进而论及鲁壁和汲冢书中发现的所谓蝌蚪文，到篆隶的演变。有五个论点值得注意。一是讨论中国人的四方观点，认为中国人很早就与西方来往，特别指出：“儒家竭力切断中国与西域的所有联系，设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任何有关西域的回忆。”二是认为《尚书》的成书年代甚至会晚于被认为是此书编者的孔子时期。三是认为《周礼》《仪礼》也是后人伪造的，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完全没有提及这两部书。四是认为汉字的起源时间在周宣王时期，其形态已经可以被用来记载国家的收支。五是除却《春秋》《易经》外，没有一部著作早于孔子时代的典籍。

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孔子和孟子和三部经书为中心。

关于孔子，作者认为孔子有四个贡献。一是从前人手里和政府档案中获得了写作的技能，加以完善并传授给民众，“在他之前，未曾有过一个关注民众教育的民间学派”。二是“他还是学会了汉语及其方言中所有汉字的书写方法”。三是整理《诗经》，王西里按西方分类划分为婚歌、情歌、戏谑嘲讽之歌、阿那克里翁之歌、谋取生计之歌等，作者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展开讨论。四是整理《春秋》，认为该书“似乎是写在2英尺的简上，每支简上8个字，有人认为数千字，有人统计为18000字，另有人认为其中缺少1400字。关于此书的出现时间同样说法不一。孔子似乎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春秋》的写作（平均每昼夜写60余字）”。经过孔子整理的《春秋》《诗经》主导了中国早期的思想史。这些具有教育意义的基本要素，许多民族至今也没有，自然无法以之施教。在这方面，中国人丝毫不逊色于另外两个古老民族犹太人和希腊人。西方的近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两个民族。

关于孟子，作者认为《孟子》是一部问世时间可能更晚的作品。这部书已经在引用《论语》《诗经》乃至据说后来才增补进伏生篇

目的《泰誓》。《孟子》的语言不仅比《书经》和《论语》更加易懂，而且也比《礼记》的篇章浅显，因此几乎可以不借助注释来阅读。作者认为赵岐在注疏过程中将自己的许多思想加入《孟子》之中，而且为了使增加的内容得以流传，他还将此书字数确定为34685个字。现在《孟子》中有35226字，由此可见此书经过了多次的增删补缀。

关于《孝经》，作者认为这是一部论述儒家的家庭伦理方面的著作。《礼记》论宗教与政治，《书经》是执政意愿的表达。这三部书是汉代或汉前不久出现的一部文集或汇编。

第七章论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要讨论《周易》，认为这部著作的注释和增补之作，可能是出自道家之手，或者是由儒家之外的人士写成的。这些人士通过儒家掌握了写字作文的能力，因此增补部分的文字费解而华丽。

第八章论道家，将《墨子》《晏子春秋》《庄子》《淮南子》列为讨论对象。第九章论佛教，认为中国人是通过佛教才知道可以用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东汉后期知道声部，唐宋以后知道韵部（守温）三十六韵。

第十章论中国人的科学发展，重点介绍先秦《禹贡》、唐代《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以及清代《大清一统志》《畿辅义仓图》《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等书。还论及中国史学传统，包括“三通”、《资治通鉴纲目》等。

第十一章论中国人的律学，认为中国第一部法律经典是《管子》。此外，重点介绍《韩非子》《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至于奏议汇编，重点介绍了《古文渊鉴》和《历代名臣奏议》等。

第十二章论语言学、评论、古董。语言学著作有《尔雅》《佩文韵府》《骈字类编》。评论类著作有《白虎通义》《风俗通》《人物志》《古今注》《学林》。古董类著作有《博古图》《古今图书集

成》等。此外还介绍了农书、兵书、花卉类著作等。

第十三、十四章才是现代文学史论述较多的内容，作者称为雅文学、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还介绍应举考试诗文，涉及《文选》《渊鉴类函》，以及辞赋。

1901年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出版《中国文学史》与此相类似，秉持广义的文学史观。一百年之后，西方的文学史著作，依然延续着固有的传统。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是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①和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②。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分为上下卷，凡七编，总计五十五章。上卷四编四十章：一基础，二小说，三散文，四小说。下卷三编十五章：五戏剧，六注疏、批评和解释，七民间及周边文学。

第一编为“基础”，按照问题来写。介绍语言文字时，实际上是一部文字学及其研究的简史。涉及神话时，按照主题如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创生者概念、文化与文明的起源神话、灾难神话、创立神话等，并介绍研究情况。此外，还介绍了诸子百家、十三经。在第六编专辟《经学》一章，主要介绍历代有关经学的研究情况。强调的是“学”。与第十四章十三经重点介绍“经”不同。随后专门论及《诗经》。论及超自然文学，主要是以《楚辞》、志怪、传奇、变文、唐诗、戏曲、白话小说、《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幽默中论及笑话集、诸子中的寓言故事以及正史野史、戏剧、小说中的幽默内容。谚语、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是独特的介绍，为中国文学史所忽略。

第二编至第五编实际是分体文学史，分别论述诗、词、散文、

①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小说、戏剧的发展历程，比较简略。

诗歌部分专辟诗与画，在纵向论述中切出横向论题，论及杜甫、李白、王维等人、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文章诗画创作，这是独到之处。与传统看法不同的地方，作者论及诗歌，包括骚、赋、骈文和相关体裁。这类文体，我们通常认为是文，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包括这些文体。但是在第二十八章说明性散文中，作者认为《文选》中所含二十五种文体，都属于这种说明性散文，当然包括了骈文，作者又简述了骈文的是非曲直，与前面的论点有所冲突。此外，诗歌类没有论及乐府，而是在第七编《民间及周边文学》开头论及，显然，作者是把乐府视为民间文学。

散文部分，把志怪与传记、游记、笔记视为散文一体。我们通常把志怪视为小说。论及志怪时，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写起，论及汉代及六朝的志怪、道教作品。这部分内容，还专辟笔记一节，很有特点。

小说从唐传奇说起，符合鲁迅所说，唐人有意为小说。戏曲文学主要介绍传统的经典作品。

比较有新意的是第七编，论及民间及周边文学，主要是专题研究。如敦煌文学，是主编的强项，不同地方，多有涉及。又如地域文学，与传统的研究不同，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地区的民间流传的文学文本，如冯梦龙笔下的长江三角洲的社会、上海近郊嘉定发现的明代成化说唱刊本、江南弹词、广东木鱼书、北方鼓词和满族子弟书等。作者强调口头程式表演与讲唱叙事文学不同，认为口头程式表演指的是表演者主要从口头传承中学习的各种口头文学。其特征是对模式化材料的操作以及高度的程式主义，如说书、萨满戏、关帝故事、傩戏。而讲唱叙事文学是在写作中创作出来的，但是它模仿或发源自某种特定表演文学。有些讲唱叙事作品高度程式化，似乎是口头传统的产物，不顾它们的文本是为了阅读而非表演。另外

一些讲唱叙事作品如鼓子词的创作，是为了在宫廷上进行表演，它们通常由著名作家写成，从古典传统中借鉴了许多元素之后形成了面向精英观众的一种混血文类。最后三章则重点介绍了中国文学对周边，主要是朝鲜、日本、越南的影响。作者用“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命名。这些内容，都是学术界近年投入精力较多的领域，作者充分吸收了最新的成果。

《剑桥中国文学史》论早期中国文学，也是从“汉语及其书写系统”说起，分析汉字的特点，一是以象形文字为主；二是形式上的不确定性，可以书写外国文字，或音译，或意译；三是单音节构造。这是考虑西方读者对于汉字不很了解，都得从此开端。此外，还介绍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与王西里的著作一样，介绍早期文学史，也从五经开始，注意到口头传说与文字书写的复杂关系，也注意到最新的出土文献。比较出彩的部分是以《汉书·艺文志》为中心推测“战国文本谱系的汉代建构”。

作者预想：第一，不是机械地按照文体分类，而是以文学文化史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学史。第二，不是机械地按照朝代分段，如将东汉至初唐视为“世上最宏伟的翻译工程”，即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化的阶段，作者用两章的篇幅叙述这个历史进程。文化唐朝，即从公元650年武则天即位开始，到晚唐五代，乃至宋初五十年间。第三不是机械地按照后人的文学评判，而是特别注重过去的文学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如论《诗经》，注意其早期的阐释系统。

实际情况并不如意。第一，虽然没有按照文体分类，但依然有宫体诗、题画诗、八股文、说唱文学等。第一章中“早期帝国的诗歌”“西汉的历史叙事与杂史叙事”“秦与西汉的政治、哲学论著”，就涵盖了诗歌、史传文学、诸子论著三类。最后一节“经典的地位”主要讨论西汉学术问题。第二，虽然注重整体思考，但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若干作家的名字，如班氏家族、崔氏家族、桓谭、王充、

张衡、马融、蔡邕、建安七子、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刘琨、卢谌、陶渊明及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等，而唐朝就只有朝代而没有标列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李白、杜甫两位伟大的诗人，没有专章专节介绍。而明清部分，讲唱文学反而占据很多篇幅。可见，作者的设想并没有贯彻始终。第三，唐代文学虽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没有严格按照朝代排列。

（四）中国本土文学史

20 世纪初叶，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在编写体例上往往处于模仿阶段，或模仿域外，或模仿古代。譬如林传甲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已经编著了十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日本大学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而在中国还没有一部中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于是“将仿日本久保天随、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又参照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有关作家、作品的评价综合而成。就体例上说，主要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以文体为主，所收范围较为庞杂，有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理学、词章等，甚至金石碑帖也多有论列。与其说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学术史，或曰中国著述学史。通观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种情形并非偶然，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形。

第二阶段，进化的文学史观。1859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并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生活在 19 世纪中叶的梁章钜（1775—1849）《浪迹丛谈》中有一则“外夷月日”笔记，以猎奇的口吻论及英语对十二个月的表述，并用汉语记录了英语的发音。梁章钜当然不会想到，就在他辞世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以英语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就大踏步地挺进中国，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一个世纪。三十多年后的 1898 年

严复翻译《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成为时代性的标志，将大自然中不同物种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引进到社会生活领域，强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准则。王国维1904年撰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尼采的悲剧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等先后登陆中国，此消彼长。而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积弱积贫的现实，促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进化论学说的意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9年便发生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胡适、梁启超、陈寅恪、鲁迅等一代文化名人，从根本上说是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下，结合中国学术实际，主张个性的发挥，对于历史上似乎已无异议的各类主张，加以重新的审视，并结合中国的学术实际，开创了一代风气。

“民主”精神的实质是强调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活力。1904年，王国维出版《红楼梦评论》最早引进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学说。随后，他又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推翻了传统的观念，充分肯定了宋元戏曲的价值。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广泛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他说：“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第一次把通俗文学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